



JIA ZHI FANG WEN JI

贾植芳文集

【理论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贾植芳文集

理 论 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5年5月16日贾植芳先生于复旦第九宿舍寓所,侯艺兵摄。

理论卷目录

中国现当代文学·····	001
《郭沫若研究资料》审读意见·····	003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巴金专集》后记·····	010
《巴金作品评论集》编后记·····	014
《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序·····	017
《巴金论稿》序·····	024
瞿秋白对中国无产阶级文艺理论和文艺批评的开拓性 贡献·····	028
《中国通俗小说书目修订稿》中译本序·····	039
《中国当代短篇小说选》英译本序言·····	042
《中国现代文学词典》序·····	046
他的文学生命就是真实——在赵树理诞辰 80 周年纪念 大会暨第二届赵树理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	050
《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序·····	054
《中国现代文学作者笔名录》序·····	059
《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出版百种纪念·····	063

《中国现代通俗文学文库》总序·····	065
《郁达夫年谱》序·····	070
从清理重灾区入手·····	074
与查志华谈“现代都市小说”·····	077
关于胡风的文艺思想·····	084
六十年来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一瞥·····	093
十年来中国小说之发达·····	110
《人格的发展·巴金传》序·····	125
《新月下的夜莺·徐志摩传》序·····	127
《中国现代文学总书目》序·····	129
一部发人深省的历史实录——《苏门答腊的郁达夫》中译 本序·····	135
《缀网劳蛛》序·····	139
《中国近代文学大系》出版感言·····	141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书系》总序·····	144
“纪念胡风诞辰 100 周年暨第二届胡风研究学术讨论会” 致辞·····	148
《左翼·上海 1934—1936》序·····	151
历史的见证——《致胡风书信全编》序·····	156
比较文学·····	161
中国新文学作家与外国文学的关系——以茅盾为例·····	163
《外来思潮和理论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资料(1928— 1949)》审读意见·····	173
《比较文学导论》序·····	198
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过去、现在与将来·····	202
博采众花 以酿己蜜——《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译丛》总序·····	211
比较文学的由来和发展·····	217

范译《中国孤儿》序·····	222
《比较文学的理论与实践》译文集序·····	229
《屠格涅夫与中国——二十世纪中外文学关系研究》序·····	233
中国新文学与传统文学·····	237
《牛津格言集》序·····	252
开放与交流·····	255
《新文学作家与外国文化》序·····	257
《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序·····	262
在“中国文化与世界”学术研讨会开幕式上的致词·····	266
中国近现代留日学生与中国新文学运动·····	269
《比较文学》序·····	286
我的感想与感谢——祝贺《中国比较文学》改刊一周年·····	289
外国文学及其他 ·····	293
《近代中国经济社会》前言·····	295
旧时代的回忆和告别——关于《晨曦的儿子——尼采传》·····	297
《住宅问题》译者前言·····	302
《近代中国经济社会》再版序言·····	305
谈利用小说作材料来改编剧本——以《钢铁是这样炼成的》第六场为例·····	307
果戈理和我们·····	320
《契诃夫手记》译者前记·····	324
伟大的人文主义者拉伯雷·····	327
“用爱和信念劳动”——纪念契诃夫逝世五十周年·····	331
《契诃夫手记》新版题记·····	338
我看陀思妥耶夫斯基——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讨论会上的讲话·····	343
我看电视剧《春蚕》《秋收》《残冬》——兼谈名著改编的若	

干问题·····	349
《东方专制主义》中译本题记·····	352
一个跨代诗人的历史命运——《勃留索夫日记钞》中译本 前记·····	356
永远不会过时的事业——在中华文学史料学学会常务理 事扩大会议上的致辞·····	362
回归与超越——与俞仪方谈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命运·····	366
上海通俗文艺研究会成立大会开幕词·····	369
《人之子——耶稣传》中译本序·····	372
《危机与复兴——白银时代俄国文学论稿》序·····	375
《近代中国经济社会》新版题记·····	378

理 论 卷

贾植芳文集

贾 植 芳 文 集

《中国现当代文学》

CONFIDENTIAL

《郭沫若研究资料》审读意见

一、关于郭氏自述性选文目录

1. 按文章体裁(表现形式)分类排列。a. 诗歌, b. 戏剧, c. 文艺论、历史论、政治和社会论文(包括翻译作品的前言、文艺上的论战和斗争论文), 这种分类方法, 便于读者, 但似太偏重形式。按一般编例, 应打破样式, 按写作年代顺序排列, 显示作者的文艺政治社会思想的发展线索, 因为作家的思想是一个整体, 有机体, 他表现自己的观点, 不论文艺创作、学术研究、政治态度、社会观点, 所用形式(样式)尽管有别, 但从思想上说, 是一致的; 或者, 按内容排列(不以表现样式分类), 也易于表现统一的社会历史背景。

2. 这一栏目, 应包括生活和创作、思想三个方面, 此处缺乏作家关于生活的自述。

3. 如果为了避免与四川本^①冲突, 可以用现行办法排列, 但 a. 每类之中的文章必须按写作或发表的时间顺序排列, b. 必须补足生

^① 四川本, 指王训昭、方仁念等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郭沫若专集》(1—2),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4 年 8 月版。

活自述的部分。

4. 这部分选文,在选文内容上应比较客观、全面,应打破“三讳说”^①,从学术研究、历史观点的严格要求出发。这里已有一些体现了此一要求的选文,如署名杜荃的《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前此的《卖淫妇的饶舌》等,但做得还不够。郭在“文化大革命”前后的有关言论,曾发生重大的政治社会作用,如1966年4月28日《光明日报》所载《向工农兵群众学习,为工农兵群众服务》一文,其中自认自己过去的著作“严格地说,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他的这一倡议,震惊中外,社会政治效果很大,就应该选入。选文应该延伸到逝世为止,使他的政治、社会、文化思想的发展过程更全面、更丰富、更完整、更富于血肉。

(原稿目录中收入了1966年4月28日“烧书”文,及反胡风的《斥胡风的反社会主义纲领》文,修改稿删去,应保留。包括《科学的春天》亦不应删去。又如反胡风时,他写的另一篇有重大政治社会影响和历史文献意义的《必须严厉镇压胡风反革命集团》,亦应收入,以存历史真实。)

5. 这部分包括别人的印象、访问、追悼及评论,应以关于“人的郭沫若”为中心;评论研究文章,最好放在评介栏内;追悼文章,应该选取有过交游的人的悼文,有实质性内容,一般表态文章,尽量不选,党政首脑文章,适当选一些,它有历史政治意义。(如沈从文、钱杏邨以及王锦厚、伍加伦的《郭沫若怎样走上文学道路的》这些文章,属于研究、评论或与郭氏并无直接交往、友谊的人的文章,可以选入评论栏内。外国人的文章亦应如此。)总之,此栏的目的,是为了说明郭氏之为人,对郭氏在各个时期的形象做出具体描绘,应避免与其它栏目混淆。现在的编排方法显得有点乱,导致“自述”类所附各文(别人

① 指“为尊者讳,为长者讳,为贤者讳”的传统儒家伦理观。

的)与“评论文章选辑”界限不清。“自述”类附文,重在论人;“评论”类文章则重在论文,尺度应把握好。另外,此栏中的追悼文和记述文似乎选得少了一些,可以增加几篇。

6. 郭氏自述文章发表时如系用笔名,应保持原状。此处目录上保持了,但文前一律删去,不妥。

又,全部目录所选各文,无论自述或他人文章,都应在标题上加标写作年份,这样历史因素(时间观念)更加明确,易于辨认;选入的文章,应尽最大可能采用原始版本,如原始版本与通行版本文字出入较大,最好能以附注形式加以校勘,现在有些文章采用的是《文集》版本,又未经与原始版本对校,是不妥的(如“通讯”中之《致宗白华》、《〈王昭君〉后记》之类);选自专书的文章,如《〈蔡文姬〉序》之类,仅注明出版社及书名,而无版次说明,也是不妥的。

二、关于评介文章选文部分

应按编例,第一部分总论、总评,其次分评(专题研究);应按历史程序,选辑各个历史时期出现的代表不同思想甚至政治倾向的评文。

此处选辑分 a. 诗歌及诗集, b. 历史剧及历史剧本, c. 小说、散文、自传, d. 历史研究及考古。仍是不太理想的分类方法。关于评《武则天》的文章,当时(1962年)引起争论,正反两面有代表性的都应选一些。评解放后的诗歌,评文下限延至1981年最好。这二年关于郭的诗歌(如《百花齐放》、《东风第一枝》等)及剧本《蔡文姬》等颇有一些新的评论,甚至关于《甲申三百年祭》,也应适当选一些,以使这套资料不要离开现实太远。因这二三年内,对郭的评论,又有一些新的开展。又如《李白与杜甫》的评文(正反两面),这二年报刊每有所见,亦应收录。总之,应充分体现出全面的观点、科学的观点、历史的观点。

三、关于评论文章目录索引

首先应注意原始材料。在二三十年代的评文中,许多未注明原文出处,如美蒂的《郭沫若印象记》,只注明收入黄人影编的《文坛印象记》;张资平、王独清、徐祖正等人论创造社的文章,只注明收入1932年光华版的《创造社论》;而1936年开明版的《郭沫若评传》及黄人影编的《郭沫若论》(1936年大光书局版)所收录各家文章,多半无原出处,属第二手材料;又如关于“马克思进文庙”问题,原是在《时事新报》开展的,但收在本书内,仅从国民党陶其情编的《矛盾集》中转录,未从原载处着手,未能全面反映历史情况。如在这个论争中,李蒂甘^①写过一篇《马克思主义的卖淫妇》,郭作为答辩才写了《卖淫妇的饶舌》,但蒂甘此文,却未见收录。

又如鲁迅的《上海文艺界之一瞥》,只注明原载处的《文艺新闻》(1931年),但未提收录情况。

体例必须统一。先应注明原出处,再注明收入和被收入情况。如系专著,应列出细目(《郭沫若评传》、《郭沫若论》二书已有细目),如《创造社论》、《胡适与郭沫若》二书,应就有关郭的部分,列一细目,不必单篇抽出,每篇列一个条目。一篇文章有多处收录的,只须在该条目下注明历次收录情况就行,而不必每被录一次,就单列一个条目(如沈从文的《论郭沫若》一文,就重复写了三条。)

有的书如《抗战中的郭沫若》,未注明出版时间,但该书所收录的各家五篇论郭的文章,却分列五条写,这就与《郭沫若评传》等书的著录体例不一致了。

有的条目语焉不详,如杨殷天写的《郭沫若传》,注“收入1938年

^① 即巴金。

上海《民众》”，“民众”似乎是个杂志名称，但称“收入”，又无出版处所、版次或刊物卷期。

又如1941年11月16日重庆《新华日报》为庆祝郭50寿辰和创作25周年，出过专刊或特刊名称的专页，刊登名流祝文，这里按文章篇目分条写出，每条后详注出处，似无必要，只需在“××专刊”或“特刊”条下列出文章篇目，一总注明出处即可。

所列刊物，有的注明了编者，如凡遇《抗战文艺》皆注明姚蓬子编，但更多未注，尤其是《上海周报》、《社会新闻》之类反动报刊。其实可以一律不注。《抗战文艺》系“文协”机关刊物，更无须注明了。

总之，体例须统一，尤忌互异；分类标准亦应明确，要避免同一材料见于多处的重复情况。如《索引》(1)内已收有洪为法、钱杏邨、朱湘等人论郭沫若的文章(收在《评传》及《论》二书内)，但在原稿第二本论诗部分又重复收录，此例甚多，应予删减。应分清评文性质(总论或专题)，以类相从，每篇文章只记初见及收录情况，不必每见每出。

总的看来，这个编目在资料搜集方面做得也还不够深入，解放前的部分，尤其是20—40年代的有关文章，收录得不够全面。如1938年北新书局出版有金祖同的《郭沫若归国秘记》一书，即未见收录；郭流亡日本期间，留日学生办的《留东新闻》上有不少关于郭的记载，亦应收录；又如抗战中佐藤富子(郭的夫人)曾写有《我的丈夫郭沫若》，原载日本《文艺春秋》，中国曾有译文，应查出；(此文不知是否即此编中的《怀外子郭沫若先生》？此处无原出处，只写“收入《抗战中的郭沫若》一书”。)1946或1947年上海各报如《时代日报》、《文汇报》等所载有关郭的文章，亦以查出补收为好。

本《索引》(1)原稿第20页收入日本平凡社《世界历史大事典》及《世界大百科事典》郭沫若、创造社等条，国外材料是否考虑列一专栏？此类材料很多，举凡外国百科全书、人名辞典中几乎都有。如

30年代日本桥川时雄在北平出版的中文本《中华文化人物总鉴》等。倘若外文材料不能全面访查,只偶尔一见,则不如不收(中译转载者除外)。

在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章节一部分内,仅从李何林的《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选起,是不够的。往前推,同类著作还有1929年光明版的谭正璧《中国文学进化史》、1933年王哲甫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史》(北平版)、1936年商务版的郭箴一《中国小说史》、赵景深的《中国新文学小史》、《中国文学史纲要》等;往后也还有1947年李一鸣的《中国新文学史讲话》、王丰园的《中国新文学述评》等,1948年北平辅仁大学出过一种《1700种现代中国小说戏剧提要》,善秉仁编,苏雪林、李燕声参与其事,这些著作中涉及郭氏的篇章,都应收入。

这一部分还收入了“现代作品选”书籍有关郭氏的内容,这不属于文学史一类,而属于作品传播情况;如选文之前有说明文字,亦属于评介类型,应列入评介目录索引内。

四、关于著译系年(解放后部分)

除原写作、发表时间及发表地照录外,此部分内容须注意分清郭氏自行收入文集和被他人编入书籍这两种不同情形的界限。自行收入专集文集为收录,他人所编为被收录。后一种情况在此部分内有的地方注解不明。如1957年郭作《念奴娇·小汤山》项下,除注明载于1957年2月4日《人民日报》外,又注“收入1958年作家出版社的诗选”,此注即殊为含混。这里的“诗选”,易被人误认为是郭氏自己的诗选集,其实不是,而是出版社编的一种多人合集,属于“被收录”。此外,这条注解仅注明出版年份,未注月份及版次,此类情况在本部分里较普遍,应予改进。又同条注“见《试和毛主席韵》”,亦未注明出

版处所及时间、版次。郭氏解放后的许多文章,被收入各种书籍以至《新华月报》者甚多,如各次政治运动中所写文章,多被收入各种批判文章专集(此处有的已注出,如“反右”),甚至出《新华活叶文选》,凡此情形,皆应注明,藉以观其社会政治影响。

约作于 1982 年 4 月

(《郭沫若研究资料》〔上、中、下〕,王训昭、卢正言、林明华、邵华、萧斌如合编,收入《中国现代作家作品研究资料丛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6 年 8 月版。本文是作者作为丛书编委,为该书初稿写的审稿意见。)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巴金专集》后记

这部巴金研究资料专集,是我们从 1979 年间开始着手编辑的,中间曾就选文部分,印过一次油印本(共四册),作为我们的工作本,并分送有关兄弟院校中文系和有关人士,广泛征求意见。那里所用的材料,无论是作家自述性的作品,还是别人的评介文章,大半是以现在市面上流行的书刊为依据,比如巴金自己的作品,就是以解放后 50 年代中期以来出版的 14 卷本《巴金文集》中的印文为准的。经过同志们的建议和我们自己的认真考虑,我们觉得这部资料既然是研究性的书籍,就应该从文献学的角度,或者说从历史的观点从事编辑工作。无论是作家自己的自述性作品的选录或是评论家的评介文章的收用,都应该严格地采用初次发表时的印文,这对探讨和研究为我国现、当代文学做出巨大贡献和努力的这位作家的生活、思想和艺术道路以及检阅这许多年以来我国评论界对他的评介研究工作的成绩或失误,那条弯弯曲曲的历史过程和内涵,才有真正的学术意义和历史价值,也符合古往今来编辑研究性资料书籍的一般惯例。因为这部巴金研究资料专集,理应是巴金的文学生活历程和我国巴金评介